

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清乡”与反“清乡”过程中 各方立场的考察

卢俊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1941年,为配合日本的“南进”部署和加强汪伪对宁沪基层的控制,日汪决定联合对宁沪地区进行“清乡”。然而,在“清乡”过程中,日汪集团内部冲突不断,日益瓦解;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经过短暂的共同反“清乡”后亦分道扬镳。为期四年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呈现出抗战时期宁沪地区斗争形势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宁沪地区;“清乡”;各方立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2-0081-06

日汪的“清乡”始于1941年7月,直至汪伪政权崩溃前夕为止,历时四年之久。所谓的“清乡”,即是通过肃清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强化汪伪对基层政权的控制,确保对沦陷区的占领和资源的掠夺,最终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略部署,以支持其野心勃勃的“南进”策略。“清乡”方案一经出台,作为日汪统治中心的宁沪地区随即成为“清乡”的核心所在。

学界对于沦陷时期宁沪地区“清乡”与反“清乡”的研究颇多^[1-8],大致从宁沪地区的日汪关系互动、日伪基层组织建设、沦陷区的“合作者”与“反抗者”等角度勾勒出沦陷区日汪勾结和敌我斗争形势的大致轮廓。本文拟通过对宁沪地区“清乡”与反“清乡”过程中各方立场的考察,以期理顺这一时期各方势力在该地区错综盘结的复杂关系。

一、日汪的“清乡”活动

1941年初,随着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轴心国集团,美英等国的联盟倾向也日益明显。日本在深陷中国战场泥淖的同时,不得不去考虑应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为了扭转日益糟糕的处境,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实行“南进”政策,扩大战争规模,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太平洋地区的争

夺中去。不过,要支撑起这个庞大的军事冒险计划,日本就必须做好兵源和物资这两方面的准备——在将中国战场部队抽离出来调往太平洋地区的同时,还要保证其对沦陷区资源的控制与汲取。然而,由于中国军民的坚持抗战,日本不得不在沦陷区维持庞大的兵力以巩固统治,无法腾出多余兵力扩大侵略。这种情况下,若要顺利实现“南进”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唯有在沦陷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伪政权,才能“协助”其完成战争准备,或者至少不要让它烦心^{[9]30}。随着日本扶持的几个伪政权的合并与改组,南京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似乎成为日本当下的唯一选择。

尽管汪伪政权名义上控制着苏浙皖大部、宁沪两市以及湘鄂赣鲁豫等省的部分县市,但事实上它的统治触角还远远没有触及这些地区的基层部分。在当时唯一可称得上富裕的宁沪地区,汪伪政权虽说是推行地方自治,但实际状态只不过是收税机构而已^{[10]158},其威令基本上不出南京城。为了将汪伪政权打成一个可以协助日本统治沦陷区的有效机器,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实行“清乡”计划,“通过把握占领地区民心,扶植强化国民政府,完成局部和平”,“尽可能扩大国民政府在全国地方的人事变动等上的自主性权力,强化国民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统驭力”,

“承认以至默认中国方面的合理课税,强化国民政府的财政”^{[11]9},进而达到“强化治安、改善经济”的目的。

日汪双方很快就“清乡”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1941年2月,日军第13军团开始制定“清乡”的作战计划与封锁纲要,并在苏州成立了清乡司令部。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汪精卫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担任副委员长,李士群担任秘书长。该委员会下设总务、政务和军务三个部门,负责“清乡”的一切事宜,地位极高,与汪伪政权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并列。同年4月至5月,在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等人的指挥下,李士群先后主持召开了八次“清乡”委员会筹备谈话会,确定了“确立治安、改善经济”的“清乡”目标。此外,晴气庆胤还提出了“清乡”的指导方针,即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1]。根据“清乡”的目标与方针,会议决定,由侵华日军进行“军事清乡”,汪伪负责“军事清乡”后的“政治清乡”“经济清乡”与“思想清乡”。6月,汪精卫在南京召开“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划定“清乡”区域。由于兵力有限,会议决定在“日方最为看重”且“最易出成绩”的是京沪铁路沿线以北十余县,即宁沪地区首先进行实验性的“清乡”。

根据日汪既定的“清乡”方案,宁沪地区的“清乡”共分四期进行^[12]。1941年7月至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的两个师团和伪军的六个师首先在吴县、常熟、昆山、太仓、无锡和江阴地区进行了“清乡”。1942年春至1943年春,日伪军又对太湖东南地区及上海郊区进行了“清乡”。日汪第三期的“清乡”从1943年春一直延续到1944年初,着重于镇江和苏北地区。从1944年初到汪伪政权崩溃前夕是日汪的第四期“清乡”。在该阶段,日汪主要是对宁沪地区进行所谓的“刷新清乡”和“高度清乡”,并对其控制的皖鄂粤部分地区实行“清乡”。

在宁沪各地的“清乡”中,日汪首先进行以“扫荡清剿”为主的“军事清乡”。日汪首先在占领市镇的周围建筑起防御工事,“然后就在交通要道筑起铁丝网或竹篱栅,在水网地区就用小汽艇封锁住各个河口,将水陆的交通严密封锁后,然后再进入广大的乡村,建筑起星罗棋布的碉堡来,将包围圈一步步地缩小,企图把抗日的部队肃

清”^[13]。在“军事清乡”中,日军负主要责任,进行军事进攻;伪军配合日军的“清剿”,主要进行道路、篱笆墙、铁丝网的封锁和保护以及各据点的驻守与盘查。在“剿灭”抗日力量、隔离“清乡区”后,日汪随即进行以“肃正怀柔”为主的“政治清乡”。“政治清乡”的工作重点是在“清乡区”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切结,彻底清查、捕杀抗日力量。此外,日汪还组编了各种各样诸如“爱乡会”“自卫团”“清乡警察总队”之类的反动组织,以强化汪伪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9]34}。在控制宁沪地区的基层社会后,日汪又着手进行“经济清乡”,并美其名曰“整理建设”。“经济清乡”除了对民众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与搜刮外,还建立了一套税收系统,确保汪伪政权的税收来源。此外,日汪还制定了一系列章则,对“清乡区”的重要战略物资实行统制政策,以保证日本帝国主义对资源的汲取。最后,日汪为扑灭宁沪民众的抗日热情,进行以“反共奴化”为主的“思想清乡”。通过建立反动宣传机构,日汪不断对宁沪“清乡区”的民众进行洗脑,宣传大亚洲主义、不抵抗主义和反共建国观念。日汪还控制各级学校,编印奴化教材,组织“青少年队”“青少年团”,对青少年进行“清乡特种教育”和奴化教育。

不可否认,通过“清乡”,日汪对宁沪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对资源的汲取能力的确有了明显的增强,宁沪地区的抗日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日汪的“清乡”在短时间内收到了一定效果。

二、抗日力量的反“清乡”斗争

自抗战爆发以来,宁沪广大基层地区一直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和国民党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所掌控。新四军以常熟、江阴一带为根据地建立解放区;忠义救国军则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进行着暗杀和破坏活动^{[10]158}。然而,日汪声势浩大的拉网式“清乡”使得宁沪地区的抵抗运动顿时陷入了困境。

1941年7月,日汪首先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由于缺乏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和经验,驻守在该地区的新四军仍然强调化整为零,原地坚持,结果各战斗小组联系困难,造成各自为战,无法配合的被动局面。就在这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义救国军的部分顽军又积极“把握住”这一消灭江南地区新四军的“契机”,不但蓄意挑起与

新四军的摩擦战斗,甚至不惜借刀杀人,配合日伪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更有甚者扯着“曲线救国”的大旗,直接叛变投敌,参与到日伪的“清乡”行动中,极大地削弱了反“清乡”力量。考虑到在敌顽新式“扫荡”下新四军作战的不利因素,为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新四军主力主动放弃苏常太“清乡区”,撤退至澄锡虞及其以西和江北的苏中地区。地方则采取“避开强敌,分散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策略,撤销公开的县区党政机关,转移公开的干部和党员,“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14]299-300}。在日伪顽的夹击下,新四军在苏南东路损失惨重,未能达到反“清乡”斗争的预期效果。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苏南东路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虽然新四军在日汪的东路“清乡”中损失颇重,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苏南东路的反“清乡”斗争仍然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指出,尽管“部队受到了部分的损失,地区亦有部分的缩小,但我们的主力是保存了,其他的基本地区亦保存了或重新开辟了”;“在敌伪‘清乡’斗争中所受的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在开始一二次的‘清乡’中,是很难避免的”^{[14]302-303}。此外,会议还确定了今后宁沪地区党和部队在对敌斗争中的主要方针,即“用一切方法坚持苏南的斗争与阵地,并广泛地进行敌伪军工作与友军工作”;“严格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结交更多的朋友,孤立敌人,并适当执行隐蔽政策”;“主力切实地方化,特别注意建立和加强地方游击队与不脱产的群众武装”;“注意培养和训练地方干部”等^{[15]381}。

通过对苏南东路地区新四军反“清乡”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对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宁沪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新四军很快调整了对敌伪斗争的部署。1942年4月下旬,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江南区党委对京沪铁路南北地区的斗争方针进行了调整:京沪铁路以北地区实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坚持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实行“加强团结,坚持抗战”,“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方针。同时,中共江南区委改称为中共苏皖区委,江渭清、邓振询分任正副书记,主要领导京沪铁路以南、太湖以西的茅山地区,下设茅山地

委、太漏地委、广(德)郎(溪)中心县委等地、县级组织^{[15]381-382}。在整训部队粉碎日汪“清乡”的同时,苏皖区委和新四军还积极开展与友军的工作,孤立顽军,并发动增薪减租等群众运动,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稳定和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随着“清乡”范围的不断扩大,日汪的兵力逐渐捉襟见肘,军事封锁也日渐松弛,至1942年春夏之交,中共在京沪铁路以北“清乡区”的工作逐渐开始恢复。中共党组和武工队从江北不断地渗透到“清乡区”,建立秘密群众团体,积极策动群众运动,镇压惩治汉奸叛徒,控制了一些地区,并恢复了沙洲、常熟等地的游击点,保持了新四军在“清乡区”的影响和对日汪的军事威慑。

日汪对苏南东路的“清乡”效果似乎很是满意,苏南东路各县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项工作,随治安之确立,进展之速,出乎意外,尤以军政教三位一体,为建设新中国而取极大成果”^{[9]135}。在对苏南东路基层的“统治秩序”确立后,日汪立即移转兵锋,将“清乡”的矛头直指西路的镇江、太漏地区。1943年3月,日汪在苏南西路地区集结了大批兵力,并构筑封锁线和据点,妄图围困并消灭新四军。面对日汪更大规模的“清乡”行动,“清乡区”军民在中共苏皖区委的领导下,总结并吸取苏南东路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外线打击与内线坚持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15]384},坚持苏南西路的反“清乡”斗争。不可否认,在“清乡”的高潮时期,汪伪政权的触角已经广泛地深入到了宁沪基层社会当中,但这种高度依赖于武力的控制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随着“清乡”军队的撤离,宁沪基层社会迅速回到“清乡”前的状况,日伪的统治还是局限于“点”“线”^{[9]140}。日汪在宁沪地区经营了四年多的“清乡”,最终随着汪伪政权的土崩瓦解而彻底失败。

三、“清乡”与反“清乡”中的各方立场

从表面来看,宁沪地区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是敌对的两个阵营——日汪集团和抗日力量间的殊死搏斗。然而细细推敲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汪伪政权、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共产党新四军都有着各自的鲜明立场。

1. 日本帝国主义与汪伪政权的立场

(1) 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有限放权,“以华制华”

诚如上文所述,日本为摆脱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不得不大力扶植汪伪政权,因而抛出了“清乡”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清乡”消灭宁沪地区的抗日力量,从而将汪伪政权的“政治力推行及乡村”,实现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以便为其“南进”的狼子野心服务。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有意扩大汪伪政权的行政自主权,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上却又处处掣肘,仅仅是在行政事务、人事任免和课税等方面尽可能地扩大汪伪政权的权力,避免采取强硬态度^{[16]72},实际上仍然坚持自己对汪伪的行政指导地位。具体到“清乡”的权限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大权独揽,不仅否定了汪精卫提出的建立“一元化”领导机制的建议,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宁沪地区的“清乡”工作应由汪伪江苏省政府和清乡机构分工合作,实行“二元化”领导结构,其进一步分化与控制汪伪政权的面目昭然若揭。在对汪伪行政自主权进行刻意限制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伪军的控制力度。由于汪伪内部各势力对伪军指挥权的争夺直接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宁沪沦陷区的“统治秩序”,日本亦试图借助“清乡”之机,“紧缩和削弱伪军,提高伪军的积极性,来达到控制伪军”的目的^{[16]85}。在“合作清乡”的大旗下,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加紧强化伪军的战斗力,使其能够配合日军的“清乡”,另一方面又将其不信任或没有战斗力的伪军部队或削弱或整编,从而实现对伪军的总体控制。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旨在“强化国民政府”的“清乡”不过是一场“假放权,真集权”的把戏,汪伪政权完全沦为其“以华制华”的统治工具。

(2) 汪伪政权的立场:摆脱控制,“以华治华”

面对日本的“清乡”计划,汪精卫一开始是乐见其成的。汪伪政权自1940年接替“维新政府”成为唯一“中央政府”以来,一直在努力巩固其统治区域内的秩序,试图将基层社会纳入“中央政府”的节制范围内。然而,即使是在其统治中心的宁沪地区,汪伪政权除占据了一些城镇和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外,广大的农村地区仍被共产党的新四军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所控制。宁沪农村地区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不仅阻碍了汪

伪对于宁沪基层社会的控制,更使宁、沪等大城市及沿线交通要道时刻处在抗日力量的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清乡”计划似乎给汪精卫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地清除宁沪地区抗日力量的机会。除此之外,汪精卫更把“清乡”看作是增强其政权合法性的契机。由于汪伪政权对于宁沪地区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十分有限,“赋税无着,政费难筹”,因此政府没有税收来源,只能依靠日本的贷款勉强度日,使得汪伪政权蒙上了浓烈的傀儡色彩,这与其所宣传的“国府还都,恢复法统”的合法性表象格格不入。汪精卫更是意图借助“清乡”来控制宁沪基层社会经济,获得税收来源,尽量摆脱日本的经济援助,以打造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形象。同时,汪精卫还企图通过“清乡”来加强对宁沪地区基层社会的政治控制,阻止日方强加武力于地方,以期获得基层社会的支持,进而增加其与重庆蒋介石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筹码。总而言之,汪政权一直为争取对其民众的有效控制和真正独立于日本而努力^{[9]31}。

(3) 立场分歧导致的日汪冲突

针对宁沪地区的“清乡”计划,尽管日汪双方维持了表面上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双方对“清乡”的立场不尽相同,事实上,在具体的“清乡”实施过程中,日汪之间龃龉不断。

首先,在行政权的行使问题上,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要求对汪伪政权拥有行政指导权,这势必与企图借助“清乡”来增强行政自主性,洗刷自己傀儡形象的汪精卫政权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在华北政权特殊化的名义下,日本给予了华北自治委员会以高度的自治权,而作为“中央政府”的汪伪政权却只限于统治华中一隅,不得干涉华北政务,这又使得汪伪政权“中央政府”的名号有名无实。在“清乡”机构的权限问题上,汪精卫主张“一切行政均须集中清乡主管机关,统筹规划,而成一元化”,而“不论省府也、县府也、军队也、党务也,以及其他机关均须服从指挥,竭尽忠诚,协助‘清乡’工作之推进”^{[11]174},试图建立一套独立于省政府且有较大权限的“清乡”机构,以清除盘踞在宁沪基层的“维新派”势力,强化汪伪政权对宁沪基层的影响力。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实行“一元化”势必导致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不利于日本对汪伪的控制,因此极力反对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结构,日汪矛盾遂起。然而,在实际的“清乡”过程中,李士群所控制的以特工为后盾

的清乡督察专员公署却异军突起，全权管理“清乡区”内的大小事务，几乎架空了汪伪江苏省、县政府的权力机构，“‘清乡区’几乎就是李士群及其特工组织的天下”^{[16]78}。李士群借助“清乡”扩充其势力的举动又引起日汪的异常不满。不久，日汪便借“中央政府改组”之机，取消了李士群控制的警政部，“清乡”行动一时间陷于停滞。在对“清乡”伪军的控制问题上，日汪更是针锋相对。面对日本人的强化和整编，汪伪军队很快做出反应。不少伪军抗拒强化整编，因为整编完就要协助“清乡”，“‘清乡’要挨新四军打，还有可能调到太平洋当炮灰”，因此开小差或当逃兵者数不胜数。剩下的那些被迫接受强化整编的伪军大多也不是真正的忠于日本人，他们在“清乡”时，往往能躲则躲，能跑则跑。他们害怕与新四军作战，“深恐得罪了他们，给自己找来麻烦”^{[16]88-89}。日军的“强化和整编”不但没有达到控制伪军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日伪军间的矛盾，日伪军之间发生冲突甚至火并的现象屡见不鲜。

纵观日汪双方立场，显然，日本帝国主义“清乡”的目的是为了“以华制华”，而非“以华治华”，放任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坐大是其所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汪精卫打算利用“清乡”打造“国民政府”独立合法的形象，并以此巩固统治秩序的企图无疑是与虎谋皮，注定了日汪同床异梦的结局。

2.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共产党新四军的立场

(1)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立场：从制造“反共”摩擦到“曲线救国”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抗日共识，将南方八省十四区的中共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投入到江南地区。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共御外辱的大背景下，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抗日的历史^{[23]28-29}。然而，这种合作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共产党在江南地区的日益壮大，国民党内反共情绪进一步滋生，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江南地区的小规模军事摩擦不断。1941年皖南事变后，两军关系剑拔弩张，宁沪地区的忠义救国军主力纷纷出动，企图消灭新四军部队。国共在宁沪地区的内斗使得双方元气大伤，这给日汪的“清乡”提供了绝佳时机，宁沪地区的抗日热潮陷入低谷。

皖南事变带来的一系列恶果使国民党内的反共情绪有所收敛，日汪“清乡”的军事压力也迫使

忠义救国军不得不考虑保存自卫的军力，宁沪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摩擦大幅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沪地区的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皖南事变后大体保持着“各自为战”的状态。针对日汪的“清乡”，忠义救国军的打算是“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入敌伪匪（指新四军）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对于伪军除多方派员进行联系外，并委以番号名义，依情况予以整训，以便于我军对敌后地区的控制，彻底消灭新四军敌后政权势力，而利于配合盟军登陆和王牌军实力之扩大”^{[18]174}。在戴笠的授意之下，宁沪地区的忠义救国军走上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积极活动于伪军之间策动收编，俨然和伪军“成了不可分的一家人”。如果说忠义救国军收编伪军是出于争取动摇分子反正，以壮大抗日力量的目的，那么其趁日汪“清乡”之机攻击新四军甚至勾结日伪，并假借其手消灭新四军就显得不那么的“忠义”了。出于极端的反共立场，忠义救国军的部分顽军罔顾民族大义，屡屡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5月，忠义救国军第二路的郭墨涛部趁日伪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清乡”时，从淀山湖进入阳澄湖地区，与胡肇汉等部联合堵截攻击新四军；1941年9月，在反“清乡”斗争最为艰苦的时刻，忠义救国军又先后挑起五次反共摩擦；1942年1月，忠义救国军澄锡虞军事专员王文甫竟然派汉奸向日军报告新四军驻地情报，试图借日军之手打击新四军^[19]。显然，忠义救国军所谓的“曲线救国”的反“清乡”立场，只是收编伪军扩充实力，以便消灭新四军的拙劣借口罢了。

(2) 共产党新四军的立场：韬光养晦，坚持反“清乡”斗争

与忠义救国军行不副言的“曲线救国”立场不同，新四军在经过“清乡”初期的惨败之后，及时总结反“清乡”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气不馁，积极调整部署，坚持抗战，在避免与忠义救国军中的反共顽军起正面冲突的同时也主动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慢慢地在宁沪地区积攒起强大的势力，不久即针对日汪的“清乡”展开大规模的反“清乡”行动。

针对日汪的“清乡”，新四军在后期的斗争中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反“清乡”行动。为粉碎日汪的“军事清乡”，“清乡区”内线民众在潜伏的共产党的组织下，全力捣毁日伪封锁线，以配合外线新四军主力对于日伪据点的打击。针对日汪

的“政治清乡”,共产党也实行了针锋相对、恩威并施的政治攻势。一方面,在内线民众的支持下,新四军组织了便衣队,昼伏夜出,严厉打击汉奸特工,使其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又利用敌伪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关系,实行招抚为主的“一二一”政策,以争取伪军、伪政权中的动摇分子为抗日事业服务。为打击日汪的经济掠夺政策,“清乡区”民众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每当日汪抢粮队下乡征粮时,“清乡区”的军民便采取各种手段,快收快藏,使得抢粮队无粮可征。在游击队的打击和民众的反捐税示威下,对汪伪政权赖以生存的田赋和捐税的征收,督征员们更是力不从心。针对日汪的经济封锁,共产党还发动“清乡区”的民众实行改棉种粮,自纺自织。一方面,“改棉种粮”不但可以对抗日汪对于棉花的掠夺,而且还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夯实抗日武装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发动民众自纺自织,实行生产自给,实质上也就冲破了日汪对“清乡区”的禁运政策。为对抗日汪的“思想清乡”,共产党广泛开展扫盲和冬学活动,组织民众学习文化,并出版和宣传各种抗日的进步书籍和学习资料,进行抗日民主政治教育。在新四军的凌厉攻势下,日汪的

“清乡”日渐乏力,最终归于失败。

四、结语

1941-1945年宁沪地区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是一段纷杂交汇的历史。对日汪而言,尽管双方对“清乡”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面对宁沪基层复杂的社会状况,双方不得不就“清乡”的各个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实质是彻头彻尾的勾结)。然而,由于双方对“清乡”立场的不同,在实施“清乡”行动和瓜分“清乡”成果的过程中,日汪间冲突不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清乡”的攻势。对“清乡”另一端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共产党的新四军而言,面对日汪来势汹汹的“清乡”,双方不得不先暂时放下对宁沪地区基层领导权的争夺,一致对外。然而,出于极端的反共立场,忠义救国军在反“清乡”斗争中频繁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甚至举起“曲线救国”的大旗,投敌反共,助纣为虐,给宁沪反“清乡”斗争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日伪顽的夹击下,新四军在经历了初期的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极调整部署,积蓄力量,坚持抗战,最终实现了宁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完全胜利。

参考文献:

- [1] 刘其奎. 抗战时期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5): 53-58.
- [2] 古厓忠夫. 日军占领区的“清乡”与抗战[C]//池田诚. 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9: 161-180.
- [3] 沈秋农. 论抗战时期苏常太地区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J]. 民国档案, 1995(1): 100-105.
- [4] 张生. 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3.
- [5] 潘敏. 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孙江. 记忆不能承受之重——陶保晋及其后人的南京记忆[C]//孙江. 新史学: 第八卷: 历史与记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44-169.
- [7] [加]卜正民.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M]. 潘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8] 李永晶. 抗战史中的“合作”问题与中华民族叙事的重建[J]. 学海, 2017(3): 191-196.
- [9] 潘敏. 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0.
- [10] 余子道. 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158.
- [11] 中央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9.
- [12] 余子道. 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J]. 近代史研究, 1982(2): 109-135.
- [13] 肖德. 日伪在大江南北“清乡”的失败[N]. 华商报(香港), 1941-12-03.
- [14] 《新四军战史》编辑室. 新四军战史[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0.
- [15] 马洪武, 童志强. 新四军发展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16] 张生. 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3: 72.
- [17] 李国庆. 忠义救国军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4.